

# 公共讨论与国民意识之建构

——以 1930 年代《大公报·读者论坛》为中心的考察

唐小兵

**摘要:**既往对国民意识的研究中,精英的思想是如何扩散到一般民众,而一般民众对于精英们念兹在兹的思想观念又是如何进行多元的甚至创造性的解读,在这样一个文本的互动过程之中,大众呈现出来的国民意识的具体的思想构造如何、呈现出怎样的特质与限制,都缺乏必要的讨论。1930 年代《大公报》的“读者论坛”等专栏、专版,在精英言论与读者反馈构成的公共空间里,展现了国民意识的复杂面相。传统的多重面相以不同的方式在因应着现代中国的需要,既有重新激活被牵引入现代国民人格的想象世界中,也有被激烈地批评而试图为中国开新路的。西方意象在现代中国国民的观念世界中,虽是以船坚炮利的野蛮方式被移植进来,却象征着一个更高级和人道主义的文明体系。无论是古今的对接,还是中西的交冲,知识人都是绝对的主角,而他们在历史中的角色和命运则更是民国时期公共舆论中一个持久的热点。

**关键词:**民国时期;精英;国民意识;国家;国民;公共舆论

**中图分类号:**K263;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4)02-0110-09

**作者简介:**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上海 200241)。

晚清以来的近代中国面临的两大急迫任务就是“立国”以救亡图存,“立民”以保国保种。无论是清末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还是新文化时期的新青年,抑或后来的共产主义青年或三民主义青年团,都是从正面阐述青少年象征的青春气息、时代精神对于传统中国转型之重要。而梁启超对于国民有私德、无公德现象的批判,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国民性批判,科玄论战中对于所谓玄学鬼的批评等等,都在从反面破除、消解中国人人性深处的“劣根性”。这种整体性的反传统思潮,甚至指向了中国人的身体<sup>①</sup>。“东亚病夫”成为一种主流论述,为民族存亡而奋起的焦虑心态,却又同时对民族性的整体性否定纠结在一起,导致了一种奇特的否定性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是一种逆向构造的民族主义。现代中国的国民意识就是在这样一种独特的悲情意识里具体展开的,这导致它具有复杂多元的面相。在既往的对国民意识的研究中,大致局限于文学学者从虚构性的文本来进行国民性批判的再反思,或者是

历史学者从精英的思想文本出发,着眼于精英阶层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等思想源流。在这种学术图景中,精英的思想是如何扩散到一般民众,而一般民众对于精英们念兹在兹的思想观念又是如何进行多元的甚至创造性的解读,在这样一个文本的互动过程之中,大众呈现出来的国民意识的具体的思想构造如何、呈现出怎样的特质与限制,都缺乏必要的讨论。本文试图以 1930 年代初期短暂存在过的《大公报·读者论坛》来对以上问题做一细致的爬梳,希望可以之让学术界对于中下知识阶层<sup>②</sup>的思想世界和精神世界有更加具体而微的了解,从而厘清近代中国国民意识的基本内涵。具体而言,本文将以《大公报》的“读者论坛”为主体资料,结合同时段《大公报》的“社评”“现代思潮”“世界思潮”等专栏、专版展开讨论,试图在精英言论与读者反馈构成的公共空间里,展现国民意识的复杂面相。

<sup>①</sup> 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年。

<sup>②</sup> 未必指向纯粹的底层,底层没有书面叙述能力,因此很难进行研究,这样的大众指的是能够阅读报刊并进行回馈的公众,包括其时的公务员、中下知识群体、识字军官、商人等。

## 一、知识阶级与民众： 为何现代中国的主体？

传统社会是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在这种社会分类之中,士人(或者说读书人、知识人)天然地被划归到社会之中心,而其社会角色也确实是传统中国的中流砥柱,不但承担政治使命,更重要的是肩负维系地方社会、传承儒家文化的责任<sup>①</sup>。晚清以后,儒家社会渐趋变动,社会结构逐渐松动。鸦片战争以后的屈辱和创痛,让读书人在反思之中也前所未有地将自身推向了被审视的位置,并最终由读书人自己终结了延续上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现代中国国民意识的建构从一开始就与读书人脱离不了干系,是读书人将西方思想中的国民精神、平等意识等思想译介进来。这些引入的西方观念给知识人划定的社会角色(知识人也就是公民社会的普通一员而已)与知识人在当时社会实际中所扮演的角色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甚至张力。这种角色的冲突纠结着许多中国知识人的心灵世界。知识人能否转型成普通的国民?知识分子政治能否转变成公民政治?这对于一个士人传统特别深厚的社会来说,是难以回应的问题。读书人的自我批判和国民性批判,究竟是凤凰涅槃还是引火自焚?<sup>②</sup>

即使到了1930年代,《大公报·读者论坛》仍然被这样一个问题所纠缠:知识阶级与民众,究竟谁更应是现代国民意识的主体?谁更应该担负领导一个病弱的中国走出危机的使命?而导引中国救亡图存的主体力量究竟是来自传统社会的精英——知识分子还是应该换个思路,将希望寄托到民众身上所蕴含的力量?

郭斌稣在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撰文纪念曾国藩时指出:“自然贵族(与世袭贵族相对应,前者惟恃才德,后者惟恃血统),昔日尊称之曰读书人,曰士大夫,其责任在为吾民族之领导人,为吾民族文化之继承者。遇有外侮或内乱,足以摧残吾民族,或吾民族所相依为命之文化,则士大夫中之优秀者,义愤填膺,投袂而起,执干戈,冒矢石,奋死以与此大敌,相斗于血渊骨岳之中。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而不灭亡者,赖有此优秀之士大夫耳。……今日智识阶级,昔日之士大夫也。”<sup>③</sup>知识分子与传统中国的士大夫,在民国时代的公共意识里,自然地构成一个精神上连续的谱系,而无论是士大夫还是新式知识分子,都应

该是保存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中流砥柱。在现代中国国民意识的萌生、发育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两套论述。一种论述认为作为民族国家整体的一分子,每个国民(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或其他职业的个人)都应该承担起政治主体的责任,都应该痛彻地自我反省和发愤图强,以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的强盛。但与此同时,在现代中国国民意识的精神谱系里,传统中国的士大夫意识仍旧深深地镶嵌在知识人的精神世界之中,他们那种“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和精英意识,与通常的国民意识显然有着惊人的差异,因能力、地位之的不平等,而产生了责任之的不平等<sup>④</sup>。所谓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形成了一个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的国民共同体。这种表面上看起来不平等的人格结构,其实是充分考虑到常识、常情与常理的平等化的设置,正如孟子所言“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其实正是传统的遗产在现代国民意识之建构中所发生的作用。

而在一种革命叙事的框架中,像曾国藩所表征的传统社会的士大夫,恰恰代表着需要被疏离、批评甚至推倒的旧的价值体系和处事方式,只有革命的知识分子才可能催生革命的民众,而只有革命的民众才能助产一个革命中国,也就是现代中国。革命象征着断裂,而断裂标志着新生。在这样一种水到渠成的论述逻辑里,知识分子与民众是亲和的母子关系,同为现代国民之主体,只不过时间有先后,而不是对抗性的父子关系:“要完成民权主义的政治革命,第一,取得了政治地位的知识分子应极力克制传统的官僚意识,打破官僚系统,这样,庶可免致‘地位腐恶了人’,在官为官僚,在野为缙绅,铲除旧官僚之复活,防杜新官僚之新生。第二,取得了政治地位的知识分子应鞠躬尽瘁地训练革命民权之行使,基于革命民权以组织革命政府,以任用革命官吏,这样,庶可使‘人革新了地位’,建设起革命政府,完成了民权主义的政治革命!中国知识阶级对于过去整个政治演进的过程,应有深刻的显明的了解,并将由此所得到的革命意识灌输给民众,以植民权革命之基。”<sup>⑤</sup>

署名锐之的读者在《读者论坛》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大学教授失望,而这种失望心态背后折射的却正是对于大学教授的期待。这里对于大学教授的职责

① 这方面可参考钱穆《中国知识分子》(见《国史新论》)、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等著述。

② 可参阅余英时、王汎森、罗志田等学者的著作,许纪霖的《少数人的责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从另一个方面论证了知识分子传统的强韧。

③ 郭斌稣:《曾文正公与中国文化》,《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年11月7日。

④ 可参阅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努力周报》第67期,1923年8月26日。

⑤ 程方:《中国知识阶级与政治》,《大公报·读者论坛》,1932年10月4日。

作了一个二重性的区分,较高的目标是理应成为领导民族活动和民众活动的精神领袖,较低的目标是对于青年负责,培养民族优秀的接班人:

一个人的理智是个人活动的指导,一个民族的知识阶级是一个民族活动的指导,若是理智不能指导个人活动,知识阶级不能领导民族活动,则个人何需要理智!民族何需要知识阶级!我们不主张知行必定合一,但知行也得近于合一。当国家濒于危亡的时候,所谓知识阶级的领袖们,所谓大学教授们,不能深知,或知之而坐在家里头不动,我们何需要知识阶级的领袖,何需要大学教授们!<sup>①</sup>

有意思的是,当时投书《大公报·读者论坛》的另外一位读者将民国政治的黑暗直接归因于教授群体的自命清高和不问政治。这里隐含的一个逻辑其实就是1920年代胡适等人的好人政府逻辑,其反命题就是“好人笼着手,坏人背着走”的逻辑<sup>②</sup>:

民国以来的执政者,当位者,很少是学者,是专家,只是流氓气的野心家,乘机上台,把中国弄得一塌糊涂。大学教授是专家,是学者,你们应当把他们推倒,取而代之,因为你们的知识高。其他各国那一国的教授在政治上不占些势力,日本的河上肇还组织政党,他的人格一定不及你们清高么?清高就是懦弱,无能,无耻,与不抵抗耳。甚至于当刺客,当暗杀团,也应当你们先来干,因为你们智识高,认识清楚,不会拿岳飞当作秦桧。你们觉得你们的生命高贵吗?可是老百姓的生命一样高贵的,你们化了老百姓的钱,才被教育好的,你们现在要有良心去还老百姓的钱,就应当拿生命去报答,更不应当还享受物质的上等生活。<sup>③</sup>

学者从政在一般读者看来天经地义,而不从政就是对公共责任的放弃,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一些以为学术而学术自我辩解的教授学者,在作者看来就是“懦弱、无能、无耻”的清高。这种观念与丁文江在《少数人的责任》里面所阐发的精英主义和士大夫意识,形成了强烈的共振。更有意思的是,这个读者要求教授从政的理由除了教授是专家学者这种常见逻辑之外,还有一种隐含的纳税人逻辑,即教授享受了国民教

育体系里最优的资源,而其人格与普通民众是同等的,并无人格上的豁免权,因此按照承担的义务与享有的权利对等的推理,就应该出来廓清政治之污浊。这种思维方式构成了国民意识之主体性的特殊一环。国民意识之主体性并不一定意味着自身的政治参与,而对于政治参与者的建议和批评,同样彰显了中国国民意识的特性。

## 二、国民意识建构中的“传统”

晚清以降国民意识的建构过程,其主流叙述是在对传统观念、文化与道德体系的批判中形成,这种否定意识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了林毓生所言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境地<sup>④</sup>。但是我们同时也应注意到潜伏在主流之外的支流,甚至是另一种隐蔽的主流,这就是以杜亚泉的《东方杂志》<sup>⑤</sup>、吴宓的《学衡》、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为代表的另一种启蒙的道路,这种启蒙观念并不认为传统必然构成现代的对立面,传统的精神资源是可以汲引进入现代国民意识之中的。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创巨痛深的国人面对日寇之进犯,国土之沦丧,及国内之治理危机、道德文化之污浊、人心之迷乱,除了进一步呼唤强国保种守土之外,也在传统的思想源流中搜寻精神上的养分,并且提出不能过于舍弃自身的传统,以提振国民意识之内在气节。纵观历史,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社会心态与集体无意识,但这种回向传统中国寻求精神动力和自信心的行为,却遭到胡适等人的严厉批评。胡适认为面对这样一个危急时刻,更应该深刻地反省这个民族为何走到这步田地,它背负着哪些必须根除的罪孽;反省是重建自信的前提,但不能为了重建自信而美化传统<sup>⑥</sup>。

1930年代初期《大公报》的基调,其实更多的是在传统中寻求精神资源和心灵动力,来推动现代国民意识之构建。而这种国民意识的核心主题就是“救国”和“如何救国”。

《大公报》的呼吁掷地有声,对晚清以来士林面对西方世界所谓的文明与野蛮之区分,节节败退,精神上不断自我矮化的现象,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呼唤重建建

① 锐之:《国难期中对大学教授的希望》,《大公报·读者论坛》,1932年3月3日。

② 可参考台湾学者潘光哲关于《努力周报》与好人政府的讨论,见李金铨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③ 王善政:《献给大学教授们》,《大公报·读者论坛》,1932年1月24日。

④ 参阅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增订版),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⑤ 许纪霖等编《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值得细读以了解这种“调适的智慧”。

⑥ 可参阅1934年前后《独立评论》上的关于“文化、反省与信心”的相关讨论,亦可参读笔者《文化自信心从哪里来》(刊于上海《东方早报》2011年9月7日)。

国的原始精神,从远古的中国传统去寻求精神的源流,以此为精神底色而吸纳现代文明:

中国民族有此伟大的遗传,立国大陆,拥有富源,而处此世界文明自由交通之时,则当然可以随时复兴,更成伟业。然而未能者,一般士大夫,即所谓社会中坚之流,受专制时代因循利己之余毒,震惊浅薄低级之欧化,既弃先民之长,又增他国之短,遂有半世纪来有名无实之维新,及三十年来变本加厉之改革,而民生乃愈困,国事乃愈危。……然使一念转移,舍旧谋新,群自心坎里悲悔发愤,重唤起中国民族固有之精神,以秦汉以上诸先哲之智慧品性能力精神为范,一切从头创造,则御侮建国,其易如反掌也。吾敢云,今日中国人之最便于取法者,莫若大禹!忘己忘家,至勤至朴,以全民福利为目标,奋勇迈进,征服一切,此即中国建国之原始精神,亦即应为中国复兴之必需的原则。<sup>①</sup>

对士大夫精英的批评,对建国原始精神的呼唤,显示出在国民意识的建构中传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对士大夫的失望,投射的正是对于士大夫或者知识阶级的深切期待,而这种期待正是传统中国以士大夫为社会之重心的反映。

“九一八”事变之后,《大公报》基于对中日军力对比之体察和两国国情之了解,以及对于国际形势变化之预测,力主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式的卧薪尝胆,也就是积蓄国力徐图来日的忍辱负重精神。如果说刚毅进取是儒家精神结构的主动面,这种精神则是儒家精神的隐忍侧面。人格之构造,牵涉国格之获取,两者会通于国民意识之形成。由此可见,国民意识绝非横空出世,而是其来有自:

自根本上言,吾人同情忍辱负重之主张,然其解释,应如上述,一切有识见、有决心,亦有能力,负重固有计划,忍辱亦需聪明。至于假忍辱负重之名词,而徒表现无耻无能,则吾人极反对之。夫现代中国,何日不在辱中,苟有忍辱负重之精神,则重早负起,能负重斯辱不至常辱矣,何至有今日之大辱哉?今而始言忍辱负重,已证明平日之不能负重,亦未认识忍辱,是则今后之负重,又安可乎?夫中国之事,若能在忍辱负重之国家,则第一,可以使之不爆发,或缓爆发。第二,既爆发矣,则早能洞察推演之结果,而迅速的运用忍辱之道,

以缩小辱之范围。第三,既忍辱矣,则绝对真能负重,必也以艰苦卓绝之精神,老奸巨猾之态度,缜密勇敢之计划,迅图增加国力,而期雪辱之总清算。<sup>②</sup>

其时一位读者投书《大公报》开出了救国之处方,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道德主义的处方,因此公德、公益、人格成为论述的关键词,而其目的却是救国救民:

古云,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今日吾国为救国计,凡百政治,总以挽回死心为主义。挽回死心,在使人人重公德,尊公益。雷霆一震,寐患可消,钻石既投,沉疴自愈。勿见黄金而膜拜,勿见白刃而战栗,勿以个人锱铢之利,而妨碍全体,勿图一时眉睫之安,而漠视公众。人人兴起其爱国心,以成国民革命军军国民之资格,尽军国民之义务,受军国民之幸福。净洗其猥琐龌龊之恶习,跻身于清洁高尚之地位,去吾人共同薄弱之污点,为我民族历史上争一线之人格,以药今日全国心死之病。<sup>③</sup>

这种强调个体的主体性与精神力量的言论,在当时的报刊舆论中成为一种主流话语。这种主流话语与士大夫话语(或者说知识精英话语)同时并存,表面看是相互矛盾的,其实是内在地缝合在共通性的救国话语之中,而成为国民意识的集体表达。这恰恰说明强调士大夫精神的中国传统,与注重每个公民的主体意识的西方精神的有机融合。比如下文中这个读者对于真正的人民代表所应该具有的素养之描摹便具有浓郁的传统特征:

时贤论者,每鞭策四万万同胞,应人人起负救国责任,然后国乃有救。不过欲使国民人人负救国之责,其先决条件不能不需有相当之组织,如人身之有骨骼四肢,然后可运用机能、发生力量。顾现政府刻正召开“国难会议”,并拟召集“国民救国会议”之举,但前者为特殊人物,后者亦机关团体之代表,非真正人民之代表也。盖机关团体之代表,亦都热中势利,奔走权门,尤其是教育机关,挂羊头,卖狗肉,实已误尽苍生,而“浮华”“虚骄”“不切实”,凡属机关团体,均不能辞其咎。真正可以为人民之代表者,其人必不虚骄,不浮夸,不趋炎附势,能忍辱,能负重,并能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是其人必不为当道所喜,浮俗所容,所以机关团体之领袖,均无其容足之所。其于

① 《唤起建国的原始精神》,《大公报·社评》,1932年2月8日。

② 《大公报·社评》,1932年4月7日。

③ 王保民:《救国应先药四病》,《大公报·读者论坛》,1932年3月4日。

社会也,若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sup>①</sup>

另一位读者在读了《大公报》的社评《建国雪耻之一大问题》后慨然投书,将传统的智勇观引入现代国民人格之构建,其所表彰和引入的其实就是一种孔子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刚毅进取之精神:

吾尝曰凡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谓之不智。知其可为而不为者,谓之无勇。不智,耻也。无勇,亦耻也。今之中国既已如此,吾人虽欲尽竭心力以救之,如救久病衰老将弥留之父母,其结果恐无益也。是故吾人居今只有两途。一则为虽明知其不能救,仍殷殷恳恳以救之。至其气断眼闭,而殉之以身。此伍尚归死之说也。其一则为努力复哭,然其人必学贯古今,德配天地,才兼智勇,识并远近。此名此义绝非可假借以逃死。此伍员复仇之说也。<sup>②</sup>

传统构成了思想和想象力的源泉,这恰恰说明传统不是一条死狗,而是生生不息于国人的经验世界和心灵世界之中。当时的另外一位读者甚至祭出“尊孔救国”的大旗:“至于我在此时的主张何为要把尊孔二字和救国二字连起来说咧?因为孔子的学问,是极端要知耻的。论、孟、学、庸,说耻的甚多,最要的曰‘行己有耻’,曰‘知耻近乎勇’。”<sup>③</sup>传统儒家资源是如何转化为现代国民意识的,在这里有着鲜明的彰显。现代国民人格结构的重建,应该从传统儒家义理汲取资源。羞愧、羞惭等内敛型的人格又隐含着道德突破的可能,隐含着精神上奋勇提升的可能。而这种突破和提升,在作者看来就是为国民意识的建构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也就是林毓生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论述的另一种表达<sup>④</sup>。

当时《大公报·现代思潮》的主编张佛泉是一位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留学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者,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者,但当他在论述强国之路时,也没有否定传统道德之重要,认为这是法治社会最重要的基础。传统的道德主义取向,与现代的法治主义取向,在张佛泉的国民意识体系中并不冲突,而是可以相互援引和救济的:

一个已成强国的人民不必一定每个人都有极坚固的道德观念。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要奉公守法,能尽一切应当尽的义务也就够了。自然如能有正确的道德观念,是更好的。即在一个没

有上正经轨道的国家,若必以为须每一个国民都是真君子之后,方能言治,也是一种不可能的事,同时也是一种不必需的事。在这种情形之下,能有一种外力的强制,再加以福利的吸引,都很容易将大家引入一种法律上的正途。这样,法律反足以促进道德。自然,我们仍然要声明,在紊乱的社会状态之下,国民如能有正确的道德观念,是更好没有的。因为如有这样的条件,能给做领袖的人以许多实际上的方便。<sup>⑤</sup>

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的张申府在《大公报·世界思潮》的发刊词中说:

凡是一个民族要想站得住,必有其所以站得住者,必有可以站得住者。这是从外面万万介绍不来的。这必须从民族本身来找,这必须从自己历史上来找。中国的这个是什么呢?是的,中国因为几次战败的缘故,也兼因多年来处在异族专制积威之下的缘故,或也因本性本来和平的缘故,中国人的奴隶习惯实在深得不堪了,一意地崇洋媚外,一谈自己有什么东西,一谈民族自己所以自立者,便不免有许多人觉着逆耳。但是不管逆耳不逆耳,弄明白这个,揭櫫出中国民族所以自立者,至少也应是本刊所要努力的一端;而且也相信这是中国目前最切要的急务之一件。<sup>⑥</sup>

现代中国国民意识的形成基本沿着两条背离的轨道,一条是知识分子主流话语——国民性批判,以及支撑这种批判的历史虚无主义。另一种则认为国民意识未必能完全由对传统的否定和对西方价值的移植而形成,传统中国之所以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自有其不可轻忽乃至抹杀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构成民族存在最核心的集体无意识。现代知识人应该将它发掘、凝聚起来,从而为中国转型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提供历史主义的精神养分。这种历史主义对于传统中的这种隐秘力量,虽然持肯定的态度,但对于在这个传统滋养下成长的中国人的心灵习性,却持有一种最严厉的批判态度,即张申府所言的“奴隶习惯”与“崇洋媚外”。这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传统、历史等在现代中国国民意识建构中究竟应该扮演何种角色。“世界思潮”与“现代思潮”这两个专刊名称的对应,构成了有趣的对照,一个是空间上的自觉,一个是时间上的自觉意识。

① 天民:《全民起负救国责任之先决条件》,《大公报·读者论坛》,1932年2月12日。

② 乾乾:《读〈建国雪耻之一大问题〉后》,《大公报·读者论坛》,1932年4月2日。

③ 陈慎登:《尊孔救国》,《大公报·读者论坛》,1933年1月18日。

④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

⑤ 张佛泉:《没说完的话》,《大公报·现代思潮》,1932年3月26日。

⑥ 张申府:《本刊的旨趣》,《大公报·世界思潮》,1932年9月3日。

当时《大公报·世界思潮》发表的崔敬伯的文章,视角更值得玩味。他认为传统中国并非没有应对世界性竞争的斗争本能,只是这种本能未能在正常的轨道和空间里展开,而被滥用于私利的争逐。换言之,只要能够将这种民族心理的斗争本能引渡到为公共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的斗争之中,中华民族仍旧是有独立、富强与复兴之希望的。这是从反面论述:国民意识的形成,依然可以从传统汲取资源:

然吾民族之斗争本能,固未尝根本毁灭也。数千年来既不得正常之发展,一转而趋于邪曲的表现:没有公开的斗争而有隐秘的斗争,没有公共的斗争而有私利的斗争,没有公平的斗争而有偏私的斗争,没有轨道的斗争而有横暴的斗争,没有组织的斗争而有狼狈的斗争,没有规律的斗争而有把戏的斗争,没有坦白的斗争而有卑劣的斗争!流弊所及,所有政治上社会上一切恶德,无不尽量表现。阴有斗争之实,阳为礼让之名,末流的礼让与邪曲的斗争,交相互长(所谓君子愈让,小人愈妄),吾民始有今日之遭遇!陵夷至今,所有民族的精力,在“勇于私斗”的过程中,几已消耗殆尽,再加之礼让的流毒,安得不造成“怯于公战”的今日?①

道德话语对于竞争是采取压制态度的,而人类社会又无法消除竞争的现实,因此就呈现出上文所述的分裂状态。公共话语与私下行为的内在断裂,造就了虚伪的人格,在面对现代世界的挑战时,这种人格结构显然无从应对。关键是如何恰当地容许对私利的追逐,同时建立一套大家公认的竞争规则,并培养每个参与者的规则意识。如果说西方文明除了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外,还有值得中国人汲取的价值观念的话,那就是对规则的认同感和自觉服从。

这种对“怯于公战”而“勇于私斗”的国民习性之批评,早在大约一年以前的“读者论坛”就已经有人提出。由此可见,精英与民众的思想意识之间并非单向传输过程,民众并非完全被动的接受者角色,毋宁说这二者是一种互为构造和双向互动的思想碰撞和刺激:“凡以救国强国为己任之领袖人才,本身须具备的条件,如道德也,不可离开下层民众也,毅力也,服善也,才识也,勇敢也,有公心而切戒私斗也。誓以一身自始至终,勿论在野或执政,为救国工作而奋斗也。执政勿贪,在野勿怠。”②

相对于张佛泉、张申府这样的知识精英对传统在现代国民意识之形成中可能扮演角色的正面评价,部分《大公报》普通读者反而在思想上显得更为激进,他们所延续的似乎仍旧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国民性批判的基调。这反映了知识精英与一般民众的话语、思维之间并不是完全同构的。这也许可以理解为知识话语在传播上的延迟效果,亦即当知识精英的思考已经往前推进的时候,普通民众未必能够及时跟进:

考日本国民性之最显著者,莫如“褊狭”,因褊狭故睚眦必报,彼之效法西洋,跟着西洋人走,实以“报复主义”为动机,其操心也坚,其用力也果,故其成功也速。反之,中国国民性之最显著者,莫如“宽大”,因宽大故“和平”,因和平故同仇敌忾之心,与勇往迈进之气,比较脆弱,每遇横逆之来,不久则淡然相忘,习于怠忽。中国变法之不力,邯郸学步之无成,方诸日本,不啻天渊,此殆国民性之不同有以致之。③

国民性批判是近代知识人最主要的批判性话语之一。褊狭与宽大本来是一对价值相对应的词汇,从一般意义而言自然是肯定后者而否定前者,但是从民族国家的富强角度展开论述,这两套价值的意义发生翻转。褊狭反而有利于促动民族意识的创伤性体验以及追求富强的原动力,而宽大反而成就的是安于现状无所事事的不思进取、与世沉沦。这段话最有意思的就在于,传统的价值、德性、伦理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现代世界里,其价值上的自足突然开始支离破碎,难以自圆其说,一套新的注重竞争和民族国家整体意义的价值系统,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因此,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是一种个人美德的品质,在现代中国的国民批判性话语里居然成为一种造成国家贫弱的原罪。这种价值上的困扰,深层地构成了现代中国人国民意识的独特面相。

### 三、国民意识构建中的“西方”

对于现代国民意识之形成来说,西方构成了一个强劲的思想资源。引入西方学术、政论,向西方寻求真理④,比如数量庞大的留学欧美学生群体等,都在以实际行动将古老帝国引入一个更加密切互动和一体化的世界格局中。这个西方既是现代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载体,同时又具有殖民主义帝国的面孔,是一种悖论式

① 崔敬伯:《礼让与斗争——五千年文化的大转折》,《大公报·世界思潮》,1933年2月9日。

② 万家修:《怎样才能救国?》,《大公报·读者论坛》,1932年1月7日。

③ 蔡淑芳:《中日国民性之观察》,《大公报·读者论坛》,1932年8月28日。

④ 自然,在不同时代,西方指涉的具体国家、文明与制度并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有一个西方形象在国人心中分裂的现象。这方面的精细研究,可参考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的西方。而这种悖论式的西方形象深度地参与了现代国民意识之形成。

细考《大公报》报刊舆论之言路与心路,西方的精神与思想对中国人的国民意识之形成,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对个体政治责任的强调。而在传统中国的主流叙述中,天下兴亡,匹夫是无责的,所谓帝力于我何有哉,或者说天高皇帝远,士大夫才是承担公共政治责任的主体。

如何重建个人与政治的日常相关性,是困扰着《大公报》人的一个核心议题,而让普通民众认识到自身对于政治之现状同样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才是构筑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中华民族的途径。亚里士多德说,政治是人的社会属性之一。这也可视为西方政治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回应。当时的一篇社评如此苦口婆心地说道:

吾侪自己业报,即应希望自己尽其应尽之职责,求其应得之进步,对现在将来自加鞭策,对过去错误绝不宽假。当此寇深之际,正值岁首之日,吾人抱满腔之诚意,勉欲致祝辞于读者诸君之前者,实惟此“希望自己”四字。盼全国各界一切爱国人士,亦自今日始,反省自励,不必希望政府,更不必希望政府之领袖,勿庸希望社会,更毋庸希望社会之他人,专意鞭策本身,希望自己。人人希望自己者为何事,应各自审度,愚的奋进。勿论士农工商,勿论男女老幼,勿论贫富贵贱,各随其宜,以致其望。人人皆先强己以强国,谁能弱之。人人皆先富己以富国,谁能贫之。个人先加改造,政府与社会之改造,谁能阻之。国民果能各个为自己之改造,不消极,不颓丧,努力以补救过去而策进将来,国家任何难关都能打破,国家任何耻辱都能湔雪。以前之事,吾人有责任,以后之事,吾人当然不能置身事外。故改造自己者,非独善其身之谓。一切爱国人士,应抱共同一致之决心,惩前毖后,必为民族国家求出路,然不希望他人,而希望自己,不责政府社会,而各责自己,此即自救救国之唯一途径。<sup>①</sup>

胡适在论述个人与国家关系时说,把自己从遇险船(国家之比喻)上救出来就是拯救国家。《大公报》的社评与胡适的论述如出一辙,强调的都是在危难之际每个个人不能盲目地期待国家、社会或精英,而应该从自我开始奋斗,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这样

才能汇集个体之努力而成就救国之宏图。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大公报》对于政府、社会和国民多有批评,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态势。这种表面看起来似乎龌龊的论述,其实内在的理路并不冲突,无论是正面强调个人的潜能,还是反面批评个人的堕落,都是试图在民族自救和国家图存的叙事里来强调个人的意义。因此,在这样的一种国民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作为个体的国民并非一个权利本位的主体,而是一个意志的主体,一个德性的主体。这个主体蕴含着积极的能量,这种能量的发挥与民族国家的强盛是同构性的。这也正是梁启超、胡适等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所理解的个人—国家观。个人与国家并非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所论述的对抗性关系,而是一种一而二、二而一的互补关系,国家并非工具性意义的存在,而同样是一个蕴含了意志和德性的伦理存在。

其时的一位自然科学家陈振先在《大公报》撰文,以比喻的方式描述个人与政府、国家之关系,这与胡适的沉船自救比喻异曲同工,都在强调现代国民自度度人、自救救国的意义:

作者素无党派观念,惟知站在国民的立场上建言,雅不愿对于政府负责当局轻易加以非难,更不愿于掀天骇浪之中,牵掣舵师双肘,纷乱舵师心志,以为环伺舟旁张开血盆般大口的鲨鱼造机会。然若舵师低头瞌睡,或漠视职务,对于前面之礁石,竟熟视无睹,甚或因与篙师闹意见,而各不相顾焉,则同舟之人,为自己生命计,不得不骇汗狂呼,冀促舵师之注意。若呼之不恤,竟任船头触礁,穿一大孔,祸水如泉涌入,则舟中同人更不得不狂呼舵师篙师及其他同舟之人,同心协力,堵孔泼水,期免灭顶同尽之凶。但求舟中执事人员,鉴于既往之失,惩前毖后,一致努力与风涛鲨鱼奋斗,则以前之失,尽可补偿,将来诞登彼岸,渡过难关,在同人固得庆生还,在舟师更身名俱泰。同人命运,系于舟师一念之转移,舟师之功名,亦与同人之命运不能分开。吉凶祸福,惟当局善自择之。<sup>②</sup>

多数人的力量与少数人的力量(社会中坚分子)构成了对照,前者被肯定,而后者被批评,其实已经蕴含着自由主义者在中国边缘化的结局<sup>③</sup>。这种思想意识在当时中国一般的读书人心目中至少已经成为另外一种主流叙述。例如,有读者更进一步提出“全民政治”

① 《迎民国二十一年》,《大公报·社评》,1932年1月1日。

② 陈振先:《哀江南又哀周郎》,《大公报》第4版,1932年3月9日。

③ 关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学界讨论繁多,可参考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等著作。

的理念,意即每个个人都有不可脱卸的政治属性和政治责任,而这种政治形式可以防范智识阶级的背叛与堕落,国民意识生长出一种自下而上的对于精英(无论是政治精英、商业精英还是知识精英)的规约意识:

中国之出路,唯一为实行全民政治可以能救,上文已略述其梗概,至若实行考试制度,以免智识阶级卖身投靠,作文人无行与背弃主义以阿其所好;实行钱币革命与提倡国家社会主义,以使国营产业发达,免除人民失业之苦;提高民选的监察院权力,以使贪污绝迹于国内;实行征兵制度,代私兵为国有;切实奉行实业计划,以开发全国之宝藏,吾人可断言,社会因人民之有各得其所,而机阻不安之现状,自然泯灭,而所谓兵争政争党争财争,自然归于淘汰。政府为全民之发动机,政府领导吾四万万人民建设新中国以屹然立于世界,固如反掌之易。然若发动机关不用群策群力,而惟图在南京发号施令,其号令之效果与价值,人民是否闻问可知矣。<sup>①</sup>

“全民政治”隐含的逻辑就是全民意志应该对政治文化和政治意志构成制约和引导。当时清华大学文学教授俞平伯也致信《大公报·读者论坛》说:

国民党代民治国,常以诸葛自喻。夫诸葛亮之忠刘禅,天下后世知之矣,国民党果能如此取信于天下后世否耶?兹又将召集国难会议矣,此庞杂之分子皆政府所选定者也。夫政府而能负责,则一党专政,吾民国未尝反对,何必添此累赘乎?政府不能或不欲负责,则当以大政还诸吾民,岂得以此御用之咨询机关代表民意耶?即以党之立场言,合则留,不合则去,光明磊落之至,此会之设,徒以淆乱视听,又岂有必要哉?鄙人未隶任何党籍,供职国立学校,以不敢放弃国民之天责,故质直布其诚悃。如何措施,则在位者之责矣。<sup>②</sup>

民意与伪造民意判然有别,政府乃公民授权组建,这强化了公民的责任意识;民乃国之民,国乃民之国,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不可分割。

就知识精英而言,西方思想对于中国知识人最大的影响之一就是胡适所谓“重估一切价值”的怀疑精神的引入。传统中国思想注重权威和秩序,而忽视批评风气之养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众创造力的滋长。《大公报》人张佛泉在其主编的“现代思潮”中就提倡和滋养一种批评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一种认真的

精神,这种批评的态度其实就是充分调动个体的潜能,使之成为国民意识里的新的内涵:

本刊始终要作到的一件事,就是要使吾人养成一种批评的态度。我们最看不起的就是“马马虎虎”“囫圇吞枣”“人云亦云”的态度。不管是做人、治学,还是对付社会上的问题,若是出以那种态度,永只有失败。我们平常指责一般人思想上不上轨道,也正是指着没有批评的态度而言。换言之,怎样才称得起思想上了轨道?我们的回答是:有了批评的态度,就算思想上了轨道。因此所谓之思想上了轨道,绝对不指着恪守一家言训,不敢稍加以推敲而言。<sup>③</sup>

评判的态度是一种知识分子精神,而国民意识的内涵似乎需要同时将批评与信仰结合起来,敢于质疑权威,敢于表述自我,这几乎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启蒙观念。国民意识最核心的目标恰恰也是造就理性上具有自主能力的个人,而这种自主性与国家的自主性,在知识分子与一般读者的思想观念中是精神同构的,也就是说,个人自主是国家自主的逻辑前提,而国家自主是个人自主的现实保障。

西方精神对国民意识之形成的影响还体现在体育精神之引入。传统中国的读书人虽然有所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耕读传统,但其实正如《论语》里所透露的那样,绝大部分人读书人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而且在一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二元框架之中,知识人对体力劳动是相当轻视的,对于身体之健壮也缺乏应有的追求,“一介武夫”即可体现这种轻蔑。但在19世纪晚期以降中国的挫败之中,读书人开始四处寻索中国败辱于西方甚至日本的缘由,身体之羸弱(即所谓“东亚病夫”的叙述)也逐渐成为被批评的一个重要面相。这一点,我们在鲁迅、巴金等人的小说文本中屡屡可以碰触到。文明与野蛮的逻辑区分被中国读书人内在接受以后<sup>④</sup>,文明同时蕴含了精神上的现代,以及身体上的健康的双重意涵:“在今日为中国民族拼命求存时代,能兴则昌,不能兴则亡,决无犹豫之余地,今日所求存者,如德育之养成,智育之发达,均赖体育为之寄托,体育不修,德智二育失其根据,故体育修炼,在目前尤其重要,为三育之基础,关乎立国根本,为国家存亡之问题。”东亚病夫的自我认知或者说内在化,强化了作为一个民族整体上的精神焦虑,在这

① 于纯:《中国求治之途径》,《大公报·读者论坛》,1932年4月24日。

② 俞平伯:《北平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致国民政府并二中全会快邮代电》,《大公报·读者论坛》,1932年3月15日。

③ 张佛泉:《几句结束的话》,《大公报·现代思潮》,1932年8月27日。

④ 关于夷夏之辨如何变脸成文明与野蛮之辨,可阅读杨国强口述、黄晓峰整理《中国人的夷夏之辨与西方人的“夷夏之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5月30日。



样一种历史叙述中,强身健体就不再仅仅关乎个人的健康,而关系到民族的兴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从日常生活出发的小论述,与民族国家的大论述勾连的方式,与知识精英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模式如出一辙,呈现出高度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的核心也可以说是一种“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个体之事与国家之事,私事与公事,在逻辑断裂的情形下,仍旧可以轻易地发生“紧密”关联。即此可见,民族国家存亡的焦虑,已经转化成一种日常生活层面的心智结构和话语模式。模式化的话语看上去似乎空洞,但仔细思索,却反映了那个时代最普遍的公共记忆与公共生活<sup>①</sup>。

强调体育之精神,其实就是在强调国人如何顺应时代之变迁,如何在一个崇尚竞争的时代寻觅到民族立足的方位。20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竞争场所,只有富有竞争意识和竞争力的民族才能存活下来。而这种竞争意识对于中国人来说,又是与亡国灭种深自恐惧的危机意识牵连在一起的。因此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国民意识将西方启蒙运动以后的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精神<sup>②</sup>与传统中国的忧患意识紧密结合在了一起:“中国的国难,目前唯一的出路,是要以全力和敌人作一次拼命的奋斗,换句话说讲,是要努力造成一个‘适者’,因为今日的‘适者’是要成为一个有精神、有气魄的勇士,要驰骋在这二十世纪大竞争场中。反之,只知退缩,只知躲避,那不是‘适者’,是要灭亡的。”<sup>③</sup>

这种竞争意识发展到极致,就是对弱肉强食的强权逻辑的认可,势力的分量压制了道理的逻辑,成为某些读者试图彰显的国民意识之核心:

敌人若一旦终止进攻,或暂时休战,我们亦随着他人之终休而间歇的反应的变化,不抵不抗,天下太平,复上行下效的依然还玩着旧时的故态——贪安,好逸,酒色,财迷,纵横,捭阖,贿赂,贪污……这样循环演绎,不但我们民族的缺点暴露无遗,我们这个民族,实在太没志气,太无出息了!二十世纪——弱肉强食——的今日,我们这

样消极苟安的态度,还想能够生存吗?人家孜孜向上,川流不息的努力、发展、充实、进步,我们依然着天下太平,苟延残喘的优游岁月,我们还配做世界的一员以图共同生存吗?我们又焉能并驾齐驱,以与其他民族驰骋逐鹿于生生不息的修罗场吗?<sup>④</sup>

弱肉强食的竞争世界,是如何被强调救济鳏寡孤独的儒家读书人的后代接受并正当化的?竞争意识如何成为国民意识的一环,并从政治领域渗透到私人领域,开始全面摧毁传统儒家伦理所维系的道德世界的?“世界一员”的提法,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弥漫国人灵魂世界的危机意识,即作为世界一员的资格都面临着挑战。从夷夏之辨到文明野蛮之思路的内在化,中国人在国民意识勃发的同时,精神世界却在一步步地自我矮化。

#### 四、结 语

现代中国国民的孕育、诞生和成长,究竟是应该遵循推陈出新的渐进思路,还是破旧立新的激进路径?从《大公报·读者论坛》及相关专栏、专刊的讨论可见,在这一场国民精神的古今中西之争的过程里,传统的多重面相以不同的方式在因应着现代中国的需要,既有重新激活被牵引入现代国民人格的想象世界中,也有被激烈地批评而试图为中国开新路的。西方意象在现代中国国民的观念世界中,虽是以船坚炮利的野蛮方式被移植进来,却象征着一个更高级和人道主义的文明体系。落后就要挨打,而为了不再挨打就必须向打人者学习,这真是历史的反讽。无论是古今的对接,还是中西的交冲,知识人都是绝对的主角,而他们在历史中的角色和命运则更是民国时期公共舆论中一个持久的热点。

(本文获得2011年度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中国大陆新闻传播青年学者访问项目的支持,特致谢意!)

责任编辑:张朝胜

① 沈维周:《今后国民体育问题》,《大公报·读者论坛》,1932年10月31日。读者亦可参阅毛泽东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以考察身体论述在现代性论述中的角色与功能。

② 可参阅史华慈的《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等文章的论述,见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③ 李炳洪:《我们怎样做一个“适者”》,《大公报·读者论坛》,1932年11月8日。

④ 雷震:《我们要准备进攻,才能应付国难》,《大公报·读者论坛》,1933年2月4日。